



记忆之场：博物馆叙事与展演 ——以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为例

Site of Memory: A Museum Narrative and Performance Case Study of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in London

杨晶 龚越

Yang Jing Gong Yue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内容提要：博物馆不仅是展品的展演场所，更是以材料、场所为支点，重新联结个体生命记忆和历史叙事的记忆之场。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一方面通过藏品的展示还原了战争中鲜活、生动的个体记忆，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集体叙事形成互动。另一方面，博物馆以场所内诸多要素和群体共同构成的记忆之场为支点，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记忆。本文以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为例，从物质性、时间性、空间性三个角度，反思战争博物馆如何通过构建记忆之场超越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转而通过个体生命的记忆重新思考战争的本质。

关键词：记忆之场 个体记忆 身体记忆 对话 帝国战争博物馆

Abstract: Museums are not only places for the display of exhibits, but also places with materials, materials and places as fulcrum, reconnecting the memory of individual lif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in London, on the one hand, restores vivid individual memories of the war through the display of objects, and interacts with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ve narrative of nation-state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useum hopes to realize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memory site composed of many elements and groups within the site as a fulcrum. Taking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reflects on how the war museum transcends the grand narrative of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ng the site of memory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of materiality, timeliness and space, and then reconsiders the nature of war through the memory of individual life.

Key Words: Site of memory; individual memory; body memory; dialogue; Imperial War Museum



一、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

博物馆作为藏品保存的场所，向公众展示了各个国家文明与艺术的发展历程。其所保存的物品构建了一个新的历史展演现场，拓宽了历史的叙事空间。过去，战争博物馆通常将战争和暴力作为公共知识，通过聚焦整体的、主要的历史事件，构建民族国家的苦难和神话叙事。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学家从记忆的视角，将焦点从历史暴行或事件转移到博物馆的叙事、呈现和展示策略的具体形式上。苏珊·A.克兰（Susan A. Crane）认为国家历史和个人记忆有时是不一致的，因此博物馆可以通过关注个体叙事重新思考个人记忆和大写历史的关系^[1]。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认为，记忆的本质是多元和个体化的，而大写的历史或叙事有时会遮蔽个体记忆^{[2][1]}，因此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是记忆和历史博弈的产物，可以重新建构、传递和存储多维度的历史记忆。

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成立于1917年3月5日，其目的是收集和展示藏品，记录这场战争中每个人的经历，并纪念牺牲的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博物馆收集和记录自1914年以来英国或英联邦军队参与的所有冲突的证据和物品。如今，馆内收藏有23000小时的影像，1100万张照片，15000多件油画、素描和雕刻品，以及30000多张海报。另外，博物馆还积极主动地尝试记录经历者的记忆和声音。目前，帝国战争博物馆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战争物品收藏的博物馆之一。维姬·霍金斯（Vikki Hawkins）就曾以帝国战争博物馆二战展览为例，指

出跨越边界、多维度的战争记忆的解释框架可以提供多方面的故事，使得被掩盖的历史得以显现^[3]。埃尔斯佩思·范·维纶（Elspeth Van Veen）指出，“恐怖时代：9·11以来的艺术”展览以失踪的人为主角，呈现了战争文化日常实践中缺失的形象，从而对战争奇观文化作出反思^[4]。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学者关注到个体记忆的叙事和展演在博物馆学的研究中拥有巨大的潜力。博物馆通过展示战争文化的个人记忆来强调多维度、多主体的战争历史让被边缘化的小写历史和个体生命重新得到呈现。本文拟以诺拉的“记忆之场”为切入点，从物质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角度出发，探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一战展览对战争中个体记忆的叙事和展演。首先，帝国战争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根植于具体实在的历史载体（图像、事物、仪式等），通过展示多元的私人物件和口述历史，将个体记忆从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叙事中解放出来，并形成一个丰富的、充满对话性的个体记忆库。其次，博物馆通过场所诸要素的组合创造情境性的时空场域来维系观众的记忆与体验，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展演调动观众的反思与个体体验。

二、记忆之场的微观叙事

帝国战争博物馆努力收集各种有关一战的物品，包括从飞机、装甲战车、海军舰艇到制服、徽章、个人装备、奖章和装饰品，还有丰富详尽的文件、印刷书籍、影像等，旨在通过收集私人物件和口述历史，呈现更具人情味的故事，以此构建多元的战争记忆来消弭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记忆之间的断裂。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可以通过记忆的延续弥补历史叙事之间的断裂，实现与过去的对话。与此同时，博物馆通过个体记忆的叙事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张力，形成个体与社会的对话。

1. 多元的个人记忆

克日什托夫·柏米安（Krzysztof Pomian）认为：“博物馆作为一个象征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所有的展品自然而然地成为过去历史的符号。”^[5]因此，记忆之场中的遗迹作为历史符号指向了过去各种形式的记忆，而符号集群所构建的正是多元的一战记忆。传统的历史和传统的博物馆都构建了精英话语色彩的文化和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历史阐释和文化输出的功能。因而博物馆呈现的各地的艺术品都打上价值观的烙印，附上民族文化，展示出一种“记忆霸权”，使得博物馆成为宏观叙事的



文化输出平台。与日常的博物馆所塑造的记忆方式不同，帝国战争博物馆试图在记忆之场的话语型构中反抗传统、宏大的历史叙事，在单向的时间轴和历史的起承转合中寻求真切的个人生命故事和细微的历史真实。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成立之初用配额本鼓励人们捐献和一战相关的老物件，包括来自各个战区的书信原件、草图、诗歌和其他有趣的文献资料以及各色纪念品等。这些带有私人化记忆的老物件，显示了个人故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鲜活生命力。

首先，私人物品将所有的战争苦难具体化，使得个人的情感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的视野中。例如英国士兵亨利·赫尔斯为远在肯特的家人制作的一张木质卡片。这张四五寸大小的卡片上画了一个英国士兵用绳子套住了一个德国士兵的脖子，写着：“仅以此在前线祝你们圣诞节快乐。”故事主角亨利和成千上万的参战士兵一样，1914年的寒冬没有同家人团聚，而是在枪林弹雨中求生。这一物件的叙事突破了民族主义宏大话语，而是将故事聚焦于个体的私人情感。相较于爱国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博物馆通过挖掘个体叙事展现个人对家庭的爱，并以此引发观众的共鸣。多元的个人叙事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在共时性的空间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细节。与亨利相比，中士弗兰克·柯林斯却没有那么幸运，他的生命刚好停留在了1914年圣诞节那天，永远地与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分别。指挥官给柯林斯家人的通告中写道：“他的胸腔被击中，但至少没有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信和木质卡片作为记忆的载体被保留下来，引起多样化的情绪，从而打破传统的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博物馆也在不同的叙

述中描绘了不同的个体命运，构建起多元的历史空间。

其次，博物馆还展现了很多具有历史见证价值的真实物件。这些物件不仅作为历史知识对象化存在，还通过连接个人的回忆，刺激参观者的想象，构建了真实的历史情境。例如5.5英寸口径舰炮讲述了日德兰海战中的海军英雄——一等水手杰克·克伦威尔的故事。日德兰海战中，他承担了舰炮观察员的职务。有一次遭到德国军舰的炮击，整个小组的成员都死了，他本人也身负重伤，但依旧坚持在炮位上奋战15分钟等待新的命令。最后他获救了，但是几天后不幸在医院去世。G98步枪枪身雕刻的铭文和标志则向我们展示了一战士兵如何对武器进行个性化的装扮。麦德森轻机枪的主人公——加拿大的拉尔夫·韦伯上尉则讲述了如何从德国人手中夺得这把枪：“我在冲锋中登上了博克特伍德山顶，但是发现我的枪不见了，这时，有个德国军官正要向我开枪，于是我扑过去跟他肉搏，杀死了他，并把枪带了回来做纪念品。”任何一个武器都象征了战士保卫国家的抗争精神，然而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博物馆通过个人化的视角，再现了杀戮、暴力、牺牲的历史现场，同时也赞誉了勇士们不畏死亡的精神。

2. 个人化记忆构建的对话空间

帝国战争博物馆通过收集私人物件展现了多元的个体记忆，而这些个体记忆指向不同的情感与历史事件。这些物件所呈现的记忆形成的对话，使得个体的记忆与他人的记忆交相辉映，不断丰富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胡珀-格林希尔（Hooper-Greenhill）强调博物馆展览的动态过程。他认为，博物馆的知识不再是单一的而是支离破碎的，且有多元的声音和观点，更加重视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事物之间的交流与对话^[6]。所有的记忆都存在于物体与生命的勾连之间，以此揭示“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性的互动关系。在博物馆中，我们经常会意识到个体记忆与其他的回忆，甚至与集体性的社会话语形成对话关系，从而向观众呈现出一个开放性的文化场域和对话空间。

在一战这个主题下，帝国战争博物馆既展示了官方的征兵话语，又呈现了私人的应征故事。它通过对边缘化事件和经历的解读，试图实现官方与民间的对话。例如，博物馆一方面讲述了1914年英王乔治五世的17岁女儿——玛丽公主组织了一次众筹，向每一个英军士兵和殖民地士兵发放圣诞礼物的故事。圣诞节那天，50万黄铜制的小盒子被发放到军队中。烟民可以得到香烟、烟草、火机和烟斗，而不抽烟者则能够得到一个



“子弹铅笔”以及书信纸。护士可以得到巧克力。另一方面，则讲述了相反的故事。如果民众不想并拒绝加入英国军队，政府会寄一支白羽毛让他佩戴，并赠送脏话“娘娘腔，洗衣工，被吓破胆，不是个男人”。这些展品和故事所展现的个体选择实质上体现了战争时期多元价值观的对抗。如果选择参战，就被称赞为勇士和英雄，而如果拒绝，就被贴上懦夫的标签。战争记忆中并非只有单一的英雄主义的神话，博物馆通过呈现不同的故事构建了相反的话语与历史符号。而只有在这样的比较中，才能通过个人的选择突出人性的差异，映射战争的苦难与社会的巨大矛盾。

与此同时，私人的民间征兵话语也布满了整个博物馆。9岁的都柏林小男孩阿尔菲·奈特给当时的陆军元帅基奇纳写了一封信，请求到前线当一名报信员：“我是一名9岁的爱尔兰小孩，我想去前线……我非常强壮，经常打赢比我个子大两倍的家伙！”但这位勇敢的小男孩最终被拒绝。群众性的历史事件通过个人化的记忆形成不同的视角和认知，将历史中个人的选择和判断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有的人挺身而出，有的人退缩向后。在个人战时记忆与战争文明之间，形成一种双向反馈循环的“文化的循环”^[7]，丰盈和完整了关于一战的集体记忆。博物馆通过不同视角的叙事，赞扬了战争年代个体生命的勇敢，个体的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的集体价值互为表征。

三、记忆之场的展演空间

历史不再是一个静止、统一的纪念活动，而是一个流动、丰富的，具有多

重情感力量的记忆事件序列。博物馆通过建构记忆之场激活被大写的历史叙事遮蔽的个人情感和记忆，从而将展品置于新的联系和秩序中。帝国战争博物馆不仅通过个体化的叙事在时间维度上建立了过去与现在的勾连，还希望通过记忆诸要素的组合构建一个空间上的记忆之场，促使观众与个体化的记忆之间形成联结与共鸣。

1. 情境性的身体记忆

为了弥补参观者无法切身经历历史的缺憾，博物馆理论家主张：“这些展品表现出一种令参观者们‘在感官上身临其境的特质’；它们刺激着参观者们的想象，并在其心理上构架起了一座主体和物体、当下和过去的桥梁。”^[8]记忆由一系列不同的感觉、情感、语言等组成，博物馆试图通过记忆之场的展演激发各个感官的联动，在给定组成部分的情况下构建起一个情境性的历史现场。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战争记忆的紧张气氛。

博物馆在多个展台上，放置“战壕足球”——一个英国人小时候玩的战壕玩具。并且，在场馆内搭建了一个真实的战壕，再现了巨大的坦克正压过战壕的情景。另外，利用现代科技和摆放在石质展板的听筒，形象地模拟了当时士兵通过战壕的墙面听到的战火声和挖战壕的声音。不仅如此，听筒附近的站台上还摆放着与战壕相关的名牌。名牌上的弹孔依旧清晰可见，布满战火的痕迹。一战的本质是一场防御战。任何主动进攻的一方都要承受比防守方更重的损失。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都修建了数不清的战壕和堡垒，铁丝网、坑道阻拦了士兵的去路。博物馆通过创设关于战壕的情境，刺激不同感官的记忆，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一战战争的特点。博物馆创设的情境通过感性身体知觉认知逐渐上升到理性语义记忆，最后形成对一战的经验性记忆，以此弥补经验性记忆和叙事性历史之间的断裂缺憾（图1）。因此，博物馆通过感官的联动创设缺席的历史转向当下在场的经验过程，也实现了作为自我的心灵与作为他者的展品之间的交流。

另外，展演现场借助电子媒体播放了大量的一战的口述资料，通过一战故事的讲述形成了关于个体战争记忆的对话。在观众所坐的区域，还设置了飞行和炮弹环绕的音效，营造了真实的场景体验。除此之外，互动式的军装体验、军需制作、模拟指挥作战等调动了参与者的身体感知能力。让参观者拥有了一战的临时身份与角色，参与者在身体实践与操演过程中尝试去唤醒、体验、理解关于一战的记忆。博物馆通过强化个体的



身体感知构建了一个互动的、实践性的空间，将身体的知觉和实践活动与空间体验的具体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让观众全面地参与到历史记忆构建中。“博物馆的体验是一个多层次的旅程，包括个体的感受、感觉、智力、审美和社交。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学习、惊奇、反思、放松，甚至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回忆起过去的事件。”^[9]帝国战争博物馆通过各种感知方式引发人们的身体记忆，使得观众的视觉空间、触觉空间、听觉空间、嗅觉空间都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和扩展。身体作为媒介延伸了人们的感知能力，同时也为记忆提供了新的空间。

2. 纪念性的场所

博物馆通过对记忆的排列组合创设一个情境性的空间，调动了观众的感知，从而通过物品的展演建立了过去与现在，人与物的对话和交流。因此，博物馆成为了微观叙事和历史事件的象征性场域，而“记忆也顺利通过博物馆化和纪念化被制造、传递、存续或是挪用”^[10]。

在西方的博物馆陈设中，石质的材料总是更容易获得创作者的青睐。从门楣到装饰，石质的建筑让人联想到“纪念性”，就像巫鸿所说：“废墟同时象征着对‘瞬间’和对‘时间之流’的执着——正是这两个互补的维度一起定义了废墟的物质性（materiality）。”^{[11][20]}在这个展览中，整个展馆以石质的展台为主，展台上镌刻着众多的个人日记：“我们有一个优势的杀人武器是巨大的迫击炮——卡尔·约翰森汉斯，德国士兵，1914年11月9日”“他两次从同一地点向胸墙上方张望，第二次被不同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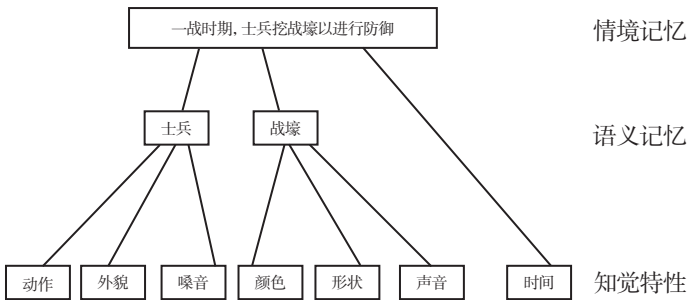


图1 战壕情境记忆图

击手的两颗子弹射穿头部。——詹姆斯·杰克少校，西约克郡第二团，1916年9月10日”。正如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所说，博物馆与其他历史表现形式的部分区别在于它们的“位置性”，他们传达的非语言的信息不仅存在于物质文化中，也存在于博物馆“特别可见的空间编配感”中^[12]。时间的流逝让很多历史消失于尘埃中，而石质的展台给人以永恒的纪念碑性，展馆设计的人企图用物质的永恒性对抗个人生命的短暂性。在帝国战争博物馆里，所有的平面展台都以石质为主，每当参观者触摸到石质平台上的文字，都易感受到多重矛盾给人带来的冲击。石质背景的永恒与个人日记的瞬间产生的时间对冲构建起时空的交流对话，让人感受到记忆的绵延与永恒，而触摸石材的冰冷与私人文字的抒情则呈现出个体生命的流动与相互交融。这样的编排与设计使得帝国战争博物馆加深了一战的纪念意义，丰富了观众对战争的感受。

四、博物馆如何记忆

帝国战争博物馆通过对历史文字、口述资料、个人物品布局整合，形成了独特的记忆模式。不同时空的物品重新汇聚，使得历史记忆一再被形塑。诺拉认为：“场所是混合的场所，是合成的变体，它与生死，与时间和永恒有着内在的联系；它置身于集体与个体、平淡与神圣、静止与变动的螺旋关系中。”^{[2][21]}。作为空间形态存在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既是作为历史遗留物的保存场所，又是历史记忆的塑形场所。那些讲述人类战争经历的老物件，再一次被赋予了巨大的价值。它们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符号，而是凝聚“行动、经验、勇气和个人忍耐力”的个体记忆。

帝国战争博物馆提供了多元叙事并行的范本，通过展陈个人印记的私人物件、口述资料等打破了传统权威的一元话语，

激活了多元的一战历史记忆。记忆之场的建构,使得看似无组织的个人记忆和情感表达被重新纳入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公共话语。阿里·坎迪(Alys Cundy)曾说:“博物馆的‘纪念’是指通过无形的仪式和有形的结构,将过去的事件表现为有意义的公共过程。”^[13]^[21]我们应该认识到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交织而成的记忆复合体,旨在延续战争创伤的永志不忘,从而维系对历史和民族的集体认同。博物馆通过接纳边缘化和非官方的历史记忆,调和国家记忆、神话与个体生命记忆之间的矛盾,使零散化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一道成为一战历史的一部分。

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所呈现的对话与互动让个体的记忆更加鲜活。个人记忆的对话互动不仅使战争中特定群体的特定情感得到关注,还与集体记忆相互映射,凸显爱国主义、世界和平的集体价值。更重要的是,博物馆远远不止是一个共时性的对话场所,它以身体、遗留物为支点,试图为参观者建立起历史经验和历史事件的对话。所以,帝国战争博物馆试图通过记忆之场建构博物馆与观众、历史与当下的联系,从而让参观者通过历史自觉反思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重要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担心博物馆的个体化展陈会面临伦理的影响和挑战。如安吉拉·洛克汉姆(Angela Loxham)说:“将战争描述为一种冒险,或者通过战争来宣扬英雄主义,可能会扼杀当代对冲突的消极方面的批判性反思。”^[14]因此,通过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一方面,可以看到博物馆如何更好地实现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另一方面,也要反思博物馆如何避免个体叙事伦理和情感问题。

参考文献

- [1] CRANE S A. Memory, distortion and history in the museum[J]. History and Theory, 1997(4).
- [2]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黄艳红, 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3] HAWKINS V. Displaying marginalised and ‘hidden’ histories at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The Second World War gallery regeneration project[J]. War and Society, 2020(3).
- [4] VAN VEEREN E. The war on terror is hard to see: the Imperial War Museum’s ‘Age of Terror’ exhibition and absence as curatorial practice[J]. Critical Military Studies, 2020, 6(3-4).
- [5] POMIAN K. Der Ursprung des Museums[M]. Klaus Wagenbach, 1993.
- [6] HOOPER-GREENHILL E.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M].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0: 151-152.
- [7]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
- [8] 阿莱达·阿斯曼. 记忆中的历史: 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M]. 袁斯乔,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34.
- [9] LEVENT N, PASCUAL-LEONE A. The multisensory museum: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touch, sound, smell, memory, and space[M].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15.
- [10] 杜辉. 后战争时代的博物馆、记忆与空间——以中英两座博物馆为例[J]. 东南文化, 2015(5).
- [11] 巫鸿. 废墟的故事: 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M]. 肖铁,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20.
- [12] WILLIAMS P. 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M]. Oxford: Berg, 2007: 77.
- [13] CUNDY A. Thresholds of memory: representing function through space and object at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1918-2014[J]. Museum History Journal, 2015(2).
- [14] LOXHAM A. Shaped by familiarity: memory, space and materiality at 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J]. Museum and Society. 2015(4).